

引文格式: 郭静伟. 文化生命体视域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命逻辑探析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5 (4): 1-9.

文化生命体视域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命逻辑探析

郭静伟

摘要:“文化生命体”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本质规定、有机体系、演化进程。作为一个历史生成的有机体, 中华文明在近代遭遇现代性危机。文化的新陈代谢与推陈出新绝不是逻辑推演与理论抽象, “结合”的出场调和了文化转型的紧张。从文化生态、思维方式、精神标识等方面廓清中华文明的知识系统, 彰显现代文明建设的理论对象与结合逻辑。转变社会机体与政治结构奠定了“结合”的现实理据; 目的性与规律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呈现了“结合”的逻辑原则; 文化自信的主体自觉、实事求是的思维原则、理论创新的历史主动拓宽了“结合”的发生路径。从理论层面与现实层面阐释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有助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生命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主体性

作者简介: 郭静伟,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同济大学基地研究员。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理论和实践研究”(23ZDA023)。

中图分类号: D64; B2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24.04.001

一、中华文明：历史生成的有机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一个博大深邃的理论命题，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一个意义重大的历史任务。从语义角度审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非话语体系经验性的推陈出新，而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各要素深层次与整体性的有机协调。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理论研究必须抛弃抽象概念转而与历史时代、具体实践紧密嵌合，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事物（或现象）的发展、它自身的运动、它自身的生命”^[2]，才能理顺中华文明的演化进程与内在机理。基于此，通过检视“文明”“文化有机体”“结合”等标识性概念，系统探究中华文明的有机形态，深层揭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结合”逻辑，为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理论参考与现实启示。

（一）文明与文化有机体的内涵及外延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涵蕴“中华文明”与“现代”两个理论对象。“文明”是一个相对的

词,“因此只能说它是摆脱野蛮状态而逐步前进的东西”^[3]。毋庸置疑,文明是一个意蕴复杂的概念,原因在于文明的两种语境:一是古典“文明”喻示对于人的教化,二则对应人的生存方式。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4]。文明作为一种研究理论对象,既表征人类创造的对象化产物的总和,又表现为人类发展的水平状态。“文明是人类最高的文化归类,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5]换言之,文明囊括了物质实现形式与进步的价值核心,本质上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物质精粹与精神境界的综合统一,是现实的人在实践基础上的进步价值与社会实现形式的总和。现代性则是一个处于开放建构状态的概念。无论是表征对照“古典”的演进特性,抑或是表达社会分析批判,从本质而言,均呈现“一种关于人类及其社会发展的态度/心理——文化/文明意义上的价值取向”^[6]。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物质层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构成,在精神层面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的创新表达。

辨正、审视中华文明需要检视文明与文化。法国学者维克多·埃尔认为文化概念是两种互相补充的观念:既是决定人类群体的行为、物质创造与制度的总和,也是人类群体行为、物质创造与制度的表现形式^[7]。胡适认为:“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而“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8]。二者的辩证关系展示为价值与形式,文化是一个灵魂的活生生的形体,文明则是灵魂的木乃伊^[9]。总而言之,文明与文化具有同构性,二者之间相互渗透、彼此促进。文化是文明的精神内核,文明则是文化的对象化载体。每种文明都有独特的文化生命现象,“都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激情,自己的生命、意志和情感,乃至自己的死亡”^{[10]20}。在斯宾格勒看来,文化是一种有机生命体,综合呈现过去与未来的世界历史图像。生命体意味着各个部分的整体联系以及生成衰败的自然过程。因此,每种文化通过各种形式、象征、细节表现独特面向,遵循生长盛衰、自我完成的历史节奏,最后文化之间产生异质感。换言之,文化的历史生成通过在不同时空场域中激活物质特性而呈现出自治性。“有机体的新陈代谢是生命的最一般的和最显著的现象。”^{[11]457}唯物史观强调主客体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作为文明的核心精髓,文化是动态存在物,基于此,文明能够被作为生命有机体来审视,必然经历萌发、生长与消亡。

(二) 中华文明醒觉意识下“结合”的出场

在维柯看来,人类的一切文明体系都是由“共同意识”^[12]发展而来。维柯开创了在文化总体框架下审视、考察人类历史现象的先河。斯宾格勒的文化有机体则是此类方法论的完善与成熟。“高级文化即是某个单一的巨大有机体的醒觉存在。”^{[13]29}在斯宾格勒视域下,醒觉意识由逻辑、科学与理解构成,本质上是不断自我调节以适应大宇宙。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民族文化则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物质积累与精神风貌的体现,作为生命体,中华文明经历了孕育、发展、定型、强化、衰败以及转型的流变历程。殷周时期孕育中华文明,历经天命神权的宗教世界观、“敬德保民”思想以及怨天尤人思潮,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春秋战国文化领域出现诸子百家相互批判、吸收、渗透、融合,初步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形态,表现出鲜明的人文意识。秦汉时期是中华文明的定型期,经济制度、官僚政治制度、家庭制度、文教制度以及伦理规范基本成熟。宋明时期是中华文明的强化期,以理学主导的统治思想呈现出理性思辨。从清代到五四时期的中华文明呈现出衰败景象,专制与蒙昧在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下轰然破碎。“每一个活生生的文化都要经历内在与外在的完成,最后达至终结——这便是历史之‘没落’的全部意义所在。”^{[10]104}旧的思想文化体系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中华文明面临资本形塑的现代文明造成的文化危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14]3-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自鸦片战争以后逐渐进入高潮。伴随着天下国家体系的崩溃，演化出以“科学”“民主”审视与改造传统文化。问题的关键在于，遭遇现代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面临两套逻辑：一是基于满足人的独立自主需求，二是强调与现代政治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前者主体是社会，后者主体是国家^[15]。两套逻辑之间的紧张关系必然会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建设进程，浸染现代文化建设的价值形态建构。从毛泽东提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16]到江泽民强调“把坚持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同积极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结合起来”^[17]与胡锦涛强调“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8]，再到习近平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9]194}，中国共产党始终围绕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使命、主要矛盾以及历史任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评判、总结、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发展。“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14]5}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通过“结合”“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1]，从而消弭了文化转型的紧张，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文化支撑与社会基础。

二、知识系统：通过观相方法体认中华文明的有机形态

列宁认为，辩证法的要素之一为“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2]。文化生命体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共同塑造同时又表征于各部分。因此，考察文化不能只抓取表面特质，必须通观文化的组成部分，揭示“所有方面的表现形式内在地结合起来的形态学的关系”^{[10]5}。“观相”方法能够整体“俯瞰”与同源“类比”文化的历史发展与未来远景。“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20]480}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精神理念、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具有鲜明的气质，“整体结构可分解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21]，表层即是文化生态，深层则是思维方式与精神标识。通过“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22]213}，能够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历史根据与现实基础。

（一）文化生态作为相适配的现实状态

“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23]人与环境的交相互作用，决定了文明的生成与发展。文明演进在一定的场域中生成，不同场域提供了有差异的自然环境、经济基础以及社会条件，从而塑造了迥异的文明形态。首先是地理环境。在生产力低下的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对于国家或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显要制约。中华文明中心区域多处于江河湖泊地带，自然地理环境的复杂多样性形塑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发展格局。其次是经济基础。不同特性的生产劳动方式构成了不同社会形态及上层建筑。“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19]92}中华文明的经济主要以静态的自然经济为主，家庭是基本生产单位，农业与手工业紧密交织，同时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随着军事与政治的角逐得到了交流融合。农耕经济奠定了中华文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平思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和谐意识、“大一统”的社会愿景以及崇尚和平的精神格调。最后是社会结构。现实的人的关系规定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展现出社会关系的复杂整合。“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

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1]传统的农业模式规定人稳定聚居在封闭区域,从事程式化的劳动,形成了相近价值观以及风俗习惯。同时,血缘纽带塑造了家族—宗族—社会的结构形态,奠定了“君父”“子民”的表里结构。业缘与血缘奠定了“家国同构”的格局,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

(二) 思维方式作为一种理智的空间存在

“当知性与言语相互结合在一起时,知性立即就形成了思维的概念”^{[13]8},并且以概念的形式在体系中“被赋予永久的地位”^{[13]9}。换言之,思维是一种自在生成的深度经验,能够廓清事物本质,形成理性构造。“思维方式不仅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它的最高凝聚或内核。”^[24]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处于文化深层结构。首先是有机整体思维呈示驾驭感性与抽象的思维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现实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有机部分都是各按其本性,循着自己的‘道’”^[25]。有机整体思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将天地人看作统一的整体。换言之,天地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具体表现为形上形下、结构内容、现象本质几者的关联辩证,表现出系统倾向与经验直觉倾向,在根本目的上则强调人自身。其次是中华文明对于事物关系的把握展现出辩证联系的思维方式。辩证联系思维是将事物看成一个不断转化、有机联系的整体。“世界具有‘道’,因为它有节奏、韵律和周期性。”^{[13]263}辩证联系思维集中体现在阴阳学说,阴阳对峙是展现事物普遍联系变化的基本形式。最后是实践理性思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观照现实人的需要。“经世致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原则和道德信条,实践理性则是“经世致用”的现代表述。实践理性精神不仅孕育、涵养了追求真理、建功立业的文化传统,而且注重实践的理性品格与刚健自强的精神气质,陶冶、熔炼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非宗教特征。

(三) 精神标识是文化固有的禀性

“在每种文化中,在每一文化阶段,都能看到一种固有的倾向,一种固有的气质和禀性。”^{[10]95}中华文明的延续传承关键在于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与精神特质,“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20]230}。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思想基础、时代精华与活的灵魂,既是维系国家统一的精神纽带,也是培育人格精神的思想基础。首先是以人为本。重民思想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人本精神。“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利民富民”从利害关系强调了人民的重要地位。传统文化的重民思想具有维护社会与国家利益的积极意义,但重民思想只是巩固君主政体的治国策略,主体仍是君主,属于人治的范畴。其次是平均平等。平均平等是中华文明的价值标识,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的彼此一致,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平等自由精神。董仲舒将均平思想纳入儒家价值系统,以仁道为原则,使均平思想成为民本思想的重要构成。均平思想本质上是小农经济的产物,主张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均调社会财富,维护农民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最后是崇德重义。崇德重义的“义以为上”“先公后私”等价值取向渗透于政治制度与个人修养,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志趣,涵养了克己奉公的施政理念,发挥了规范人心、整合价值的历史作用。

三、勃兴文明:通过“结合”冲破文化假晶现象

文化的古老形式会导致新文化“无法达成其纯粹而独特的表现形式,而且不能充分发展它的自我意识”^{[13]167}。近代以降,“会通以求超胜”“中体西用”“西学中源说”“全盘西化”“中国本位文化”的自守、中和、背弃的二元论思维不可能构筑出文化传统的超越路径^[26]。中华文明的近

代发展演化是物质生活演进与中西文明碰撞两个过程的有机统一^[27]。中华文明遭遇现代性，“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8]40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型发展是“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20]480}。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与现代化建设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1]“两个结合”能够促使传统与现代两个不同场域的通约转化，能够明确解答西学与中学二者之间的体用、本末、主辅矛盾，能够生动展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机制。

（一）“结合”的现实理据

生命的创化具有规则性和积累性。不同历史阶段积累的物质结果、生产力总和以及社会关系“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28]172}。质言之，文化生命体的创造前提不是纯粹抽象的存在，而是既定社会实践的累积，受到已有思想材料与经济政治的双重规定^[29]。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建设现代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系统。第一，封建社会有机体通过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有机体。人类历史是物质生产、人口生产、精神生产构成的社会有机体的运动过程。封建社会的物质、人口、精神的再生产构成封建社会有机体。封建社会的物质生产以农户为单位，人口生产受制于宗法思想与自然经济模式，精神生产则局限于伦理追求。专制主义与社会惰性的增长导致传统文化日益僵化。“要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19]9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有助于现代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在于现代社会发展能够决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型。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依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辩证把握公平逻辑与竞争逻辑，建构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30]。中国式现代化夯实了兼顾效率与活力、公平与效率的社会有机体建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中华文明“顺应时代发展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14]5}。第二，封建社会政治结构通过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政治结构。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受到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呈现家国同构与君权至上的架构特征。家国同构既强调维护既存秩序，同时又展示了伦理追求。封建社会政治结构通过封建意识形态以及小农经济基础得以巩固，日益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妨碍文明或文化的成长。封建社会政治结构在现代化冲击下陷入危机。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20]262-263}。中国现代政治文明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历史定向，再通过持续的社会革命与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科学理论与实践经验、历史传承与现实问题的辩证耦合。

（二）“结合”的逻辑原则

“整个人类文化史，是累积与变异，延续性与非延续性辩证统一的历史。”^[31]文化的累积、变异、调适、涵化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文化生命的成长发展。不同文化势差产生文化生命的交流“结合”。文化生命的“结合”要求不同异质文化整合形成一个相互协同、结构严密的有机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结合必须实现目的性与规律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

第一，坚持目的性与规律性相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要得到确证，必须做到目的性与规律性的辩证统一。合规律性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彼

此契合,“‘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1]。作为两种异质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向结合的前提是必须符合规律。从本质而言,马克思主义或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是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多重关系的理论映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整体、辩证联系、实践理性的思维方式同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发展、实践的观点有机贯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人为本、平均平等、崇德重义的精神标识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有机衔接。合目的性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彼此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彼此成就,一方面体现在马克思主义能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获取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与群众基础,另一方面体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激活下展现出时代样态,二者的有机结合、辩证统一就是“新的文化生命体”。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向型建构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抽象、思想精髓、伦理精华,能够科学阐释中国价值、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第二,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22]212}中华文明的思想理念既有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又能随着时代变迁与时俱进。因此,需要做到薪火相传、勇于创新,“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2]21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是中国人民历史创造活动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有机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对其构成性要素以及价值规范在新的时空条件下不断进行重构、激活。换言之,文化生命体的重构、激活是对文化生态、思维方式、精神标识的批判与再造。问题在于文化生命体的再造,面临异质文化冲击时产生的离异与回归。离异表现为对于近代文明的趋近,可能导致产生文化自卑心理,回归则会导致复古守旧^[32]。文明演进是积累、借鉴、革新、综合的复合过程。中华文明的再造必须辩证处理好继承性与创新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坚持继承性是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对其思维方式、价值理念、人文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形式,以此激活中华文明思想精髓、伦理菁华的生命力;坚持创新性则是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依据时代发展进一步完善其思维方式与伦理取向,增加中华文明精神旨归、价值关怀的感召力。

(三)“结合”的发生路径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11]410}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合”,作为方法论能够实现双方优势结合、功能互补。“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19]164}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长逻辑在于辩证把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基因、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必须坚持文化自信的主体自觉、实事求是的思维原则、理论创新的历史主动,“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20]480}。

第一,坚持文化自信的主体自觉。文化自信表征文化创造主体与对象化客体之间的正向精神状态,是文化创造活动的精神动力。“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2]228}中华文明蕴含的价值体系、文化内涵以及精神品质,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标识,也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来源。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每一有机体的生命的节奏、形式和绵延性,以及那一生命的所有表现细节,确实是由它的种类特性所决定的。”^{[10]19}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与价值创见,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生成与发展的深厚土壤,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血脉与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的历史时期始终坚定文化自信的坚实根基,表明既要依据时代发展创造先进形态,同时也

证成了自身的合理性。其一，文化自信源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维、特质、价值的准确定位与高度认可，传承千年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精神标识深刻形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因此要“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20]482}。其二，文化兴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伴随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3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民族气质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指引，提升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文化软实力。其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实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禀赋构成了“四个自信”的深厚底色。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维原则。“‘实事求是’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20]81}“实事求是”源于《汉书·景十三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34]，经历了从治经方法的价值论到理性方法的认识论的近代转型。在中国共产党视域下，“实事求是”被毛泽东赋予了辩证逻辑，并且依据时代条件与具体实践，持续增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维形式。作为认识论，“实事求是”从古典到现代的历史演展是一个脱离直觉与伦理思维，转向辩证与唯物思维的过程。“实事求是”的理性转化折射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持久生命力与时代变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历程中经历了概念“同类项”的内容结合以及民族精神的价值结合^[35]。“实事求是”从古典语义到党赋予的现代内涵，本质表征着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贯通，呈现民族历史与实践理性的辩证统一。“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20]481}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维原则，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式与内容、整体与部分、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

第三，坚持理论创新的历史主动。“文化是一种创造，是现实的人面对现实需要的一种创造。”^[36]文化生命体本质上是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文化生命体的发展始终呈现现实的人通过历史实践探寻本质的过程性存在。“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20]482}现代性本质决定了文化生命体发展的必然性。“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保持现代文明的生命活力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各族人民的主体地位，必须鲜明展现主体性与人民性的统一。首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党，党的百年奋斗凝结着我国文化奋进的历史。”^{[22]12}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实践中，党正确处理科学原理、具体实践、优秀传统文化三者关系，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其次，必须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14]74}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最大增量，决定现代文明的价值旨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超越传统文化母版、马克思主义模板、国外文明翻版，是“一套既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又与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兼容的意识形态体系”^[37]。最后，必须坚持各族人民的主体地位。“在人民的壮阔奋斗中，随处跃动着创造历史的火热篇章，汇聚起来就是一部人民的史诗。”^{[22]266}马克思主义通过实践的观点清算了抽象、机械的文化观念，彰显了人民是文化创造的实践主体。各族人民是伟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者与享有者。面对新的时代条件，各族人民基于具体实践与美好需要必然会再生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精神标识。

四、结语

“重要的并不是各种形式的原始意义，而是各种形式本身。”^{[13]47}文化作为一个生命体，是在

独特场域生成的对象。文化之间的影响、传播实际上取决于接受主体的选择以及文化本身的禀赋。作为生命体,文化的现实属性与精髓要义始终并存。肇端于静态的自然经济与家国同构的社会环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生命体的意义在于能够新陈代谢、推陈出新。“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成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粹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相互融通、激活聚变,进而完成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充实二者的有机统一。“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38]“结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科学方法。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扎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这二者相互作用需要经历漫长“格义”与“契合”的历史过程,这样才能实现良性互动、有机聚合。概言之,要辩证把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同时“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39],在新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环境中切实体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合理畛域,始终以坚守文化主体性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J]. 求是, 2023 (17): 4-11.
- [2] 列宁选集: 第2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3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11.
- [3] 福泽谕吉. 文明论概略 [M]. 北京编译社,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30.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97.
- [5] 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 周琪, 刘绯, 张立平, 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 26.
- [6] 万俊人. 现代性的多元镜鉴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2 (7): 4-20.
- [7] 埃尔. 文化概念 [M]. 康新文, 晓文,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54.
- [8] 胡适文集: 第4册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3.
- [9] 袁祖社.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内蕴及实践进路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3 (17): 4-13.
- [10] 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 第1卷 [M]. 吴琼,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3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2] 维柯. 新科学 [M]. 朱光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9: 103-104.
- [13] 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 第2卷 [M]. 吴琼,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 [15] 林尚立. 当代中国政治: 基础与发展 [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7: 288.
- [16]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707.
- [17] 江泽民文选: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255.
- [18] 胡锦涛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639.
- [19]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20]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21] 李宗桂. 中国文化导论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 250.
- [2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 第1册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296.
- [24] 蒙培元. 中国哲学主体思维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3: 182.
- [25]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3卷 [M]. 梅荣照, 王奎克, 曹婉如, 等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 467.
- [26] 刘文嘉.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诉求 [J]. 哲学动态, 2022 (12): 5-12.
- [27] 左玉河. 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动力、机制及路径 [J]. 史学集刊, 2023 (1): 18-22.

-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3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9] 张岱年，程宜山. 中国文化精神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7.
- [30] 胡颖廉. 党领导社会建设的历史、现实和经验 [J]. 理论学刊，2023（4）：34-43.
- [31] 郭齐勇. 传统文化的精华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131.
- [32] 章开沅. 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 [M]. 增订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
-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758.
- [34] 王玉樑. 实事求是价值哲学研究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17-129.
- [35] 尚庆飞. “第二个结合”深层逻辑的三维分析 [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2）：41-48.
- [36] 陈先达. 文化自信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77.
- [37] 马戎. 实事求是建立中华民族文化自信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4）：142-152.
- [38] 列宁选集：第4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3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85.
- [39] 习近平.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J]. 求是，2023（20）：4-9.

Exploring the Life Logic of Chinese Modern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Organism

Guo Jingwei

Abstract: “Cultural organism” vividly demonstrates the essential provisions, organic system and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historically generated organism,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suffered a crisis of modernity in modern times. The metabolism and innovation of culture is not a logical deduction or theoretical abstraction, but a combination of which reconciles the tension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The cultural ecology, thinking mode, and spiritual identity clarify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highlights the theoretical object and logic of combin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al organism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lays the foundation of the practical justification for the combination;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purpose and regularity,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presents the logical principle of the “combination”; the subjective self-awareness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the thinking principl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solidify the path of occurrence of the “combinatio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t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evels will help draw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organism;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ubjectivity

（收稿日期：2024-03-04；责任编辑：晏小敏）